



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术团体 ——敦煌经籍辑存会

孙玉蓉

20世纪20年代,我国的有识之士鉴于国宝敦煌经卷大批被外国人劫掠而去,还有一部分散佚在国内的私人手中,辗转运抵京师图书馆的敦煌经卷,也所藏无多,国人已无从窥其全豹,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,促使他们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致力于敦煌经籍的搜集、整理、保存和研究工作的学术团体——敦煌经籍辑存会(简称“辑存会”),旨在引起世人对敦煌经籍的重视和关注,希望唤起更多的有志之士,参与到敦煌经籍的研究工作中来,承担起抢救现存国宝的任务。

“辑存会”的第一发起人是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(1881—1968,号遐庵、玉虎)。经他积极鼓动、四处联络,学术团体“辑存会”终于有了眉目,教育部次长兼京师图书馆馆长陈任中(仲骞)、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高步瀛(阆仙)、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(夷初)、陈垣(援庵)、沈兼士、马衡(叔平)以及京师图书馆“敦煌石室唐人写经室”负责人俞泽箴等,都成了“辑存会”的积极响应者。“辑存会”终于初具规模。1925年9月1日下午,他们在设于午门历史博物馆的“辑存会”会所,举行了比较隆重的成立典礼。会上,宣读了叶恭绰撰写的《敦煌经籍辑存会缘起》一文。成立典礼结束后,他们还一起参观了历史博物馆。因为那时的历史博物馆虽然正式成立已经四五年了,但是,始终没有条件对外开放。直至1926年10月10日,才正式对外开馆,开展览馆藏国宝,为期也仅仅四个星期,便以“双阙巍峻,殿宇高



寒,冬令参观,殊多不便”为由,闭馆了。由此可知,1925年9月1日参加“辑存会”成立典礼的专家学者们能够一起参观历史博物馆,这也是对他们的特殊优待了。

如果放在今天,有这样多的名流学者参加的文化活动,新闻记者一定会报道的。然而,那时却不然。因为时局不稳,军阀混战,文化活动虽然有许多知名人士参加,也未能引起媒体记者的重视,至今,我们也未能从当年的报刊上查找到相关的报道消息。这就为我们日后了解这段历史留下了难题。

1929年3月17日,陈垣先生在致叶恭绰信中说:“丙寅夏,公发起敦煌经籍辑存会……”(见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,145页)。这里所说的“丙寅夏”,是1926年夏。

1930年春,陈垣先生在撰写《〈敦煌劫余录〉序》时谈及:“十三年(1924)夏,都人士有敦煌经籍辑存会之设,假午门历史博物馆为会所,予被推为采访部长,金拟征集公私所藏,汇为一目。登报匝月,应者寥寥。”(《陈垣集》,201页)

陈垣先生前后两次的说法,就相差了两年时间。这说明他对“辑存会”的成立时间已经记不准确了。因为序文很快便公开发表,而私人之间的通信,则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结集出版(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),读者才得以见到,所以,历史和目录学家王重民在1961年撰写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·后记》时,就采纳了陈垣的“1924年夏”成立了“辑存会”的说法,指出:“距今三十七年以前,即公元1924年,以陈援庵先生为首的一些爱国的和爱古代文化典籍的人士,在北京组成了敦煌经籍辑存会,对帝国主义分子盗窃我国敦煌遗书的悲愤痛恨之余,拟合群策群力,调查征集,作‘有系统之整理’,并编出一部所有敦煌遗书的总目录。”(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》,商务印书馆,1962,551页)而从事陈垣研究的教授、学者,则在辽海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《陈垣年谱配图长编》的记事中,也同样采纳了陈垣的这一说法。

再看对“辑存会”第一发起人叶恭绰的相关记载,那就更离谱了。在1936年开始编纂、1946年印刷出版的《叶遐庵先生年谱》(简称《叶谱》)中,竟然说“辑存会”的成立时间是1921年11月1日。在这条谱文中,编者没有说明史料的来源和依据。但是,我们知道《叶谱》在这十年间,是“经十余人之纂辑,始勉强成书”的。这样经过长时间、且多人经手完成的书稿,难免有

疏忽之处,因此,出错的可能性也就稍大一些。让我们不解的是,谱主叶恭绰当时尚健在,而且是“辑存会”成立典礼的亲莅者,他怎么就没有指出这个失误呢?最简单的解释是叶恭绰也记不准确了。

正因为叶恭绰是“辑存会”的重要发起人,而《叶谱》中对“辑存会”的成立时间又言之凿凿,这就增加了它的“可信度”。于是,后来的专家、学者就多采纳了《叶谱》的说法。如在史学家李新总编的工具书《中华民国大事记》中,就记载着:1921年11月1日“叶恭绰等发起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”(第1册,830页)。同样采用《叶谱》说法的,还有著名学者季羨林主编的工具书《敦煌学大辞典》中的“敦煌经籍辑存会”词条(880页)。此外,许多学者的论文中也多采用这一说法。

真实常常在人们不经意之间被忽略了。就在学者们以讹传讹之时,我们却忽略了叶恭绰所作的《敦煌经籍辑存会缘起》一文。虽然《缘起》的文末没有注明写作时间,但是,它却在《遐庵汇稿》“书启”类中,被编排在了“民国十四年”中。我们知道《遐庵汇稿》是“以类相从悉以著作年月先后为次”编排的。如果按照“辑存会”成立于1921年的说法,《缘起》一文也应该编排在1921年内才对。对于这一点,至今没有人去斟酌。

从《遐庵汇稿》的编者俞诚之1930年8月1日写讫的《例言》中,我们获知该书“始由闽侯樊守执右善纂辑,初稿自民十四着手,迄今六载而成,凡三十五万余言,其搜讨之勤,取材之富,可睹一斑”。既然是从1925年着手搜集编选的,而且是由樊守执(右善)一人经手的,而《缘起》一文又恰好属于当时的近作,按道理说,应该是编排不误的。正是这个细节,为我们今天重新考查“辑存会”的成立时间问题,留下了一个佐证。

说到这里,我们就要感谢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学者、“敦煌学”的有心人、京师图书馆“敦煌石室唐人写经室”负责人俞泽箴(1875—1926)了,是他在当时的《日记》中,记载了应邀参加“辑存会”成立典礼的全过程(参见本文第二自然段),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原始记录。俞泽箴是著名学者俞樾的侄孙,是现代文学家俞平伯的堂叔。1926年俞泽箴病逝后,是学术修养世代相传的俞氏家族,将他的《日记》经心保存了八十余年,尤其是经过“文革”运动,能够幸免于难,真是奇迹!前不久,笔者有幸看到了俞泽箴的家藏《日记》手稿,并从中发现了有关“辑存会”的记载,弄清了“辑存会”的正式成立时间,既不是1921年11月1日,也不是1924年夏,而是“1925年9月1



日”,纠正了学术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讹传。

从学术角度,笔者相信从俞樾一脉相传下来的俞氏家族的学术品位,因此,也相信俞泽箴的《日记》是真实可信的。但是,孤证总难以让人信服。于是,遵照陈垣先生“凡研究讨论一事,如证据未充分时,决不可妄下断语”的教导,本着严谨审慎的学术态度,笔者最终还是为俞泽箴的记载,查找到了一个比较有利的旁证。即在1926年10月10日出版的《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》创刊号上,刊登了《海外所存敦煌经籍分类目录》,在其《小引》中,除介绍该《分类目录》所包含的内容和编纂的经过外,也在篇末提及了:“客岁番禺叶玉虎氏,曾与国内学者,有敦煌经籍辑存会之设。将来所成,必光且大,本馆此辑,不过大辂之椎轮耳。”查阅《中文大辞典》,获知“客岁”即“去年也”。虽然没有说明具体的日期,但是,八十余年前的原始记载,又是当时“辑存会”“会所”所在地——历史博物馆馆刊所言,而且字里行间明确表示出对“敦煌经籍辑存会”寄予的厚望。这些文字应该是可信的。

(作者单位: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)

清代民族地区平原开发与边疆经略

对北方民族地区平原的开发是清代边疆经略的重要内容。从内蒙古土默川平原、后套平原的开发来看,由于前者是在清早期对准噶尔用兵的背景下开发的,后者则是在西北用兵结束后的清中后期开发的,因此两者在开发模式上迥然不同。首先表现为组织形式、程序与耕作方式的不同。土默川平原以公垦为主,是在官府的组织下开发的;后套平原以民间私垦为主,是由地商组织农民开垦的。土默川平原主要是旱地开垦和旱作农业,后套平原则是以开渠引水、灌溉的水田农作为主。其次是生产关系的不同。土默川平原的农民分别与官府、贵族、蒙古士兵等直接结成租种关系,后套平原则是地商先从蒙古贵族、召庙喇嘛手中包租土地,然后再租佃给农民。两大平原的开发,对于清朝西北用兵、保持驿路畅通、稳定内蒙古中部及北部边疆等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(作者:张世满 摘自《学术月刊》2009年第4期)